



讲座档案

主题:
诗心·诗情·诗意

嘉宾简介:李少君,1967年生,湖南湘乡人,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,主要著作有《自然集》《草根集》《海天集》《神降临的小站》等,被誉为“自然诗人”。曾任《天涯》杂志主编,海南省作协副主席,海南省文联副主席,现为《诗刊》副主编,一级作家。

听「自然诗人」李少君讲述诗歌的历史地位



李少君

很多人都听过“仓颉造字”的故事。传说仓颉是一个猎人,为了把山里猎物的情况告诉其他人,他便把动物的脚印画在沿途的树上或石头上,这样有人经过时,就能看到他留下的标记,知道附近有什么猎物。他想,既然脚印可以用来代表动物,那万事万物都可以用图画的形式来表达,这便有了象形字。

汉字作为一种象形字,其本身就是一种图画的形式。“草”字在古代就是草的图画,认识了“草”字就可以识草,其他汉字也是如此,所以,汉字从一开始就带有诗情画意。孔子曾说过:“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;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中国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汉字的基础上的,从这方面而言,既然诗是语言文字的最高形式,那么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建立在诗的基础之上。

诗教是最早的教育

中国古代有一种最基本的教育方式,叫“诗教”。众所周知,在儒家经典里,《诗经》永远排在第一位。孔子认为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,古代的人最开始识字时,都是通过诗歌学习的,再通过认识汉字来认识万事万物,所以,诗教是最早、最基本的教育。

诗教的重要性在《鲁记》里面也有记载,“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;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诗教也。”说的是一个地方的民众如果为人处世温柔厚道,一定是诗教的结果。诗教也体现了个人的文明和教养,《论语》中孔子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“可以言诗者也”,能够谈论诗歌的人,一定是修养极高的人。

此外,诗教的“教”还包含了“宗教”的意思。钱穆、林语堂都曾说过,在中国古代,诗歌替代了宗教的作用。中国是没有一个超越人之外的宗教,不像西方的基督教,基督教认为人都是有罪的,上帝是无罪的,因此在西方的宗教里神是超越人的。但在中国,像儒家推崇的老师(孔子),佛教推崇的释迦牟尼,他们都是人,所以中国推崇的实际上是高于一般人的人,一个更有觉悟的人、大写的“人”。而诗歌作品包含了中国人的价值观、人生标准、宇宙观和世界观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中国的诗歌就是中国人的宗教。

有人可能会觉得诗歌跟自己没有关系,但仔细想想,在你人生最痛苦、最绝望的时候,其实能想起来很多诗歌的教诲,如刚毕业找工作时处处碰壁,会用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给自己树立信心;遇到挫折时,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让你的精神重新得到振奋;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则是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式,阴晴圆缺是自然规律,悲欢离合亦是人生常态。所以说,中国的宗教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宗教,通过不断地学习,不断地提高,不断地觉悟,达到一个新的境界,以获得人生的意义,成为一个大写的“人”,一个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的人。

改革从诗歌开始

唐朝时期,佛教经典传入中国,为了向普通百姓宣扬佛教教义,就要用白话和口语的方式,随之产生大量白话小说。唐朝大量传奇小说、白话小说实际上都是在宣传佛教的一些教义,这是白话小说产生的一个根源。那为什么五四时期还要开展白话文运动呢?五四时期前后的小说有什么变化吗?

仔细看来,张爱玲的小说与《红楼梦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,当然,张爱玲记录了新的时代、新的人物、新的情感,但是她在写作形式、表达方式上都没有变化。那么,文学革命真正变革的是什么呢?是诗歌。如果中国文化的基础是诗歌,既然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,就只能从诗歌开始。新诗和旧体诗一个是格律诗,一个是自由体;一个是文言文,一个是白话文。当时像胡适、周作人、鲁迅等都不是以诗歌闻名,但他们也带头写新诗,他们知道要彻底改变中国文化根基一定要从诗歌开始,因为诗歌里面保留了中国人的价值观、美学观、生活方式、思想观念。

湖畔诗人汪静之是五四时期最早写爱情诗的人,他的诗写得非常简单,基本上是这样的:我走在龙岗书城里面,突然看见一位美女走过去,我就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,又看了一眼,再看了一眼。这样的事情在五四之前是不可想象的,所以当时湖畔诗派的作品引起轩然大波,但现在看来是那么的平常。这种思想的解放、观念的转变不是从天而降的,而是经过许多作家、诗人的共同努力、共同斗争得来的。

为什么我们不认识罗隐、杜甫,但在读到“今朝有酒今朝醉,明日愁来明日愁”会感动,读到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时仍然会流泪?是诗歌将他们的情感保留下来了。诗用最精粹的语言记录保存了人类的生活、人类的经验、人生的意义……也因此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,帮助人们形成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。

文字整理:陈洁

图片:深圳侨报通讯员 潘金辉 摄